

收稿日期:2023-03-10

论东北城市空间与身份认同的文化书写

——以《张医生和王医生》为例

唐红,李珂

(蚌埠医学院 公共基础学院,安徽 蚌埠 233000)

摘要:城市化进程加快了沈阳等东北城市的转型。不同于学界其他作者聚焦产业工人厚描东北的传统叙事视角,《张医生和王医生》从两位医生沉浮人生的微观视角切入,力图描绘出沈阳城市空间和文化景观变迁的宏大图景。两位医生在沈阳新旧文化语境的撕扯中遭遇了身份困境,但同时也努力地寻求新的文化认同、建构新的文化身份。个人将空间嵌入其社会化进程中,借此来区分自我与他者,以期实现自我目标,完成社会认同到心理认同的转变,从而形成一个完整的基于空间语境的文化身份认同。

关键词:《张医生和王医生》;东北;城市空间书写;知识分子;文化身份

基金项目:安徽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重点项目“九十年代以来中国疫病文学中的伦理叙事研究”(SK2020A0362)。

中图分类号: I206.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6873(2023)04-0111-08

作者简介:唐红(1986—),女,安徽六安人,蚌埠医学院公共基础学院讲师,硕士,主要从事英美文学研究;李珂(1986—),女,安徽合肥人,蚌埠医学院公共基础学院副教授,硕士,主要从事英美文化研究。

DOI: 10.16401/j.cnki.ysxb.1003-6873.2023.04.058

斯图亚特·霍尔将文化身份定义为“在某一空间里个体与他人的交互关系中建构的、依据各种社会力量的动态发展变化着的主体的多重截面”^[1]。由此可见,空间与个人的文化身份建构密切相连。个人将空间嵌入其社会化进程中,借此来区分自我与他者,实现自我尊严与目标,完成社会认同到心理认同的转变,最终形成一个完整的基于空间语境的文化身份认同。空间与个人文化身份认同之间,存在着一种辩证关系,即空间是建构个人身份的重要维度,而社会与文化意义又通过空间实践将意义形塑于个体之中。

作为曾经的东北工业重镇,沈阳有着悠久的工业历史和厚重的工业文化底蕴。和东北其他工业城市一样,改革开放初期沈阳原有的产业结构发生调整,1990年代的市场经济重心南迁给这座老城再添转型之殇,而今城市化的到来则进一步加快了沈阳老城区的移除和改造步伐,商场、咖啡馆、写字楼等取代过去林立的工厂,成为新的城市景观。沈阳的曲折发展为扎根于这片沃土的作家群体提供了丰富的创作素材,近年“铁西三剑客”便从“自身的童年经历出发,致力于勾勒出沈阳城的众生百态”^[2]。但无论是双雪涛的《平原上的摩西》还是班宇的《空中道路》,这些

作品中的沈阳或者东北始终笼罩在落日余晖般的萧瑟中,小说字里行间展现出工业改革对东北人的影响,流露出对旧日辉煌的无限留恋,而这些文字的背后流淌的是产业工人群体对这座城市的集体记忆。

《张医生与王医生》由媒体人伊险峰、杨樱共同创作完成,2021年出版,荣获首届“刀锋图书奖”年度十大好书,是一部聚焦沈阳这座东北老城的力作。不同于之前提到的“沈阳作家群”,该书作者将目光锁定在医生这一知识分子群体。张晓刚和王平两位医生都出生于上世纪70年代初,来自传统的东北工人家庭,但他们没有选择和父辈一样的职业道路,而是凭借自身的努力,由“奖学金男孩”成长为优秀的医生,在自觉与不自觉间完成了阶层飞跃。该书作者凸显主人公的职业特质,强调主人公的社会身份,将目光聚焦于张医生和王医生这样的知识分子群体,他们是众多以东北为背景的文学作品或者影视作品中被有意或者无意遮蔽掉的群体,他们也是在城市化的缓慢进程中支撑起城市生产和消费途径的中坚力量之一。正如张医生所言:“在整个城市坍塌、解体、坠落的过程中,他们不但没有掉队,而且逆势上升。”^{[3]3}而这恰恰是当代沈阳精神和文化风貌的生动体现。作者以两位医生沉浮人生的微观视角切入,力图描绘出沈阳城市空间和文化景观变迁的宏大图景。两位医生在沈阳新旧文化语境的撕扯中遭遇了身份困境,但同时也在努力地寻求新的文化认同、建构新的文化身份,这与沈阳这座城市的曲折发展互为隐喻。张医生和王医生近半生的人生历程是流动的、鲜活的、跑步向前的,也是沈阳城市发展前行的缩影。本文拟借助福柯、卡斯特等学者提出的新旧空间理论,探究沈阳城市空间在全球化和后工业化时代呈现出的新特征,以揭示城市空间变迁与知识分子群体文化身份建构的交互影响。

一、自我身份的文化认同

康奈尔将男性气质定义为“社会性别关系中的一个位置,同时借此位置男女两性投入其中进行社会性别实践,以及这些实践所产生的在身体体验、人物个性和社会文化上的效果”^[4]。不同社会阶层的男性气质具有不同的文化属性,体现不同的气质模式。上世纪中叶,伴随着工业人口的大量涌入,沈阳和它所处的东北地区一跃成为当时工人阶级占比最多的地区,工人构成了这座城市绝对的人口多数和中坚力量,勤劳、奋进、团结等工人阶级文化特质组成了城市中支配性的男性气质,融入都市文化肌理,成为沈阳特定的文化标签和城市性格,即“沈阳性”。张晓刚、王平和无数的沈阳人一道成为这种男性气质的忠实拥趸。父亲作为当时大多数沈阳工人家庭的主要经济来源者,是绝对的家庭权力中心和男性气概象征,自然也成为了两位医生男性气质主要的习得来源和模仿对象。

但在两位医生的成长过程中,父亲角色的权威表达面临着来自社会和家庭的双重挑战,他们的坎坷遭遇几乎和沈阳这座城市的命运互为隐喻。张晓刚的父亲张岐在变电所上班,懦弱而老实,一辈子兢兢业业,但在妻子杨淑霞眼中,他“动手能力不强、指望不上、使不上劲”^{[3]200},这些统统都被看作是没有男性气概的表现。而王平的父亲王宝臣则是黎明厂的劳模,但他“抽烟、打扑克、不顾家”^{[3]221}。两位父亲的生活终日围绕单位展开,在家庭中则表现得“任性而懒惰”,这与“勇武的工匠式”的工人阶级男性气质大相径庭,因此两位医生对父亲都颇有微词,或多或少地都表达了对他们的“不信任,甚至是失望”^{[3]200}。随着沈阳城市工业结构的转型,下岗潮的到来导致大量工人离开了自己奋斗多年的岗位,两位父亲同样未能幸免,他们“被无情地淘汰”^{[3]261}。“面包获得者”地位的动摇和昔日职业光环的黯淡导致他们遭遇父权制和男性气质的双重危机。制造业的转移以及城市向消费转型的大背景催生了以服务业为代表的第三产业的蓬勃发展,女性“抓住了为精英阶层服务的劳动岗位的机会”^{[3]262},在经济收入中占据着越来越重要的位置。在家庭中,“赚钱和持家能力都被两位母亲包在身上”^{[3]151},女性上升为更有用处、更具优势的一方,

其主导地位被前所未有地加强。两位主人公也毫不吝啬地赞美母亲。张晓刚觉得自己如今的生活得益于母亲“审时度势的智力和天然的感受力”，“他的家庭经受了那二十年残酷的考验，同样来自于母亲操盘家庭的能力”^{[3]254}，王平觉得自己40岁后“突然把母亲的身上的优点捡起来，重新爆发了”^{[3]254}。两个家庭中男女社会性别的颠倒和错位使得两位父亲没能阐释“何为男子汉”，这也间接导致了两位医生在家庭空间中自我身份认知的失败，故此他们将目光转向了另一个活动场域——学校空间。

上世纪80年代的沈阳，通过学习实现阶层跃升并不是大多数人的选择。当时的沈阳，工人依旧是“一个很有保障的群体，很多人希望可以子承父业或者子承母业，成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这是最主流的选择”^{[3]142}。威利斯指出：“作为未来的工人阶级，他们认为男性气概的重要性远远大于知识储备。”事实的确如此，张医生和王医生这一代人当中，“高中升大学的比例不会超过20%，且高中生本身的比例也已经很低了”^{[3]142}。得益于两位母亲的深谋远虑，两位医生高中时已是班级中成绩方面的佼佼者，并有着“强烈的上升愿望”，他们是霍加特在《识字的用途》一书中提到的“奖学金男孩”。但成绩优异与否显然不是衡量男性气质高下的标准，因为“奖学金女孩的女性精神，诸如安静、文雅、闲适等特征，与父亲的、工人阶级的男性气概是相对的”^[5]。因此两位医生在读书时期被打上了“娘娘腔”和“书呆子”的污名烙印，在成长过程中也总是遭遇来自同学肉体和精神上的双重霸凌。两位医生成长于产业工人家庭，工人阶级的生活方式、阶级性格和文化风貌俨然已经成为他们的生活底色，但同时作为“奖学金男孩”，他们在求学和之后的事业发展中，会逐渐脱离通常的工人阶级生活方式，完成“去工人化”的身份蜕变。这两种不同属性的文化必然会带来身份上的互相撕扯，身份焦虑也会接踵而至，而这几乎成了沈阳都市转型期的现代症候。

无论是延续产业工人的男性气概，还是坚持“奖学金男孩”的成长之路，都可被归结为他们这代人的文化选择和身份认同。张医生和王医生的同龄伙伴们将男性气概当作是“面对社会的立身之本”^{[3]170}，他们从父辈处学习男性气概的历程随着沈阳城市转型而中断，他们同样经历着身份的焦虑和困惑。按照戈夫曼的拟剧理论，如果将沈阳这座城市比作一个巨大的舞台，工人阶级在那个年代依旧是这一舞台前景的主要演员。对前路感到惶惑的高中生们也开始了“自觉的表演”，而扮演自己熟悉的工人阶级形象无疑是最安全的选择。因此他们不断强化自己的男性气质，以增加所扮演角色的可信度，具体表现为：“语言上要敢于说脏话，行为上要变得粗手粗脚，适当表现出大男子主义。永远摆出一副你这个人怎么这么多心的表情，还有一种方法就是大口喝酒。”^{[3]190}男性气质越来越成为一种行为，一种公共表演的形式，最终铸成一层坚硬的面具，其下掩藏的是少年们心中难以宣之于口的恐惧：“不够爷们，就没有办法适应这个凶险的社会。”相较之下，张医生和王医生的成长之路是“被保护起来的，以免被社会干扰”^{[3]151}，他们被隔绝在真实的东北社会语境之外。他们自小就被父母时刻提醒“注意，别跟社会上那些人来往”，或者“少跟那些人打连连，他太社会了”^{[3]170}。“社会”散落在父母和同龄人的口耳相传中，深藏于沈阳城的街头巷尾间，逐渐变为了一只面目可怖而又神秘莫测的怪兽，“窥视着都市的每一寸空间”。因此，张医生和王医生都在不自觉地抗拒“社会”的到来，张医生的求学之路甚至“延续到了2001年”^{[3]170}，因为他们既不愿意成为父辈那样“社会交往不行”^{[3]151}的缺乏男性气概的失败者，也无法真正地融入这个所谓的“社会空间”。他们徘徊于工人阶级主流文化圈和知识分子文化场域之间的阈限空间，成为都市空间的“闲逛者”、波希米亚式的知识分子，他们选择和社会保持着或近或远的距离，“他们和社会之间隔着一条又是怀疑又是嘲弄又是羡慕的鸿沟”^{[3]25}，无法实现萨义德所言的“圈外人”向“圈内人”的身份转变和升级。而随之而来的文化身份焦虑，一方面影响了两位医生的价值取向和人生选择，另一方面也是他们重构身份的基础或前提，由此也开启了两

近半生的对生命意义的追寻和对自我身份的探求。

二、个人发展空间

(一)医院诊室

医院因其特殊的空间职能,承载着众人对生命的诸多感悟,因此被赋予丰富的文化内涵,甚至具有文化隐喻。有趣的是,医院作为一种被形塑的文化意象,经常以南辕北辙的形象出现在文学作品中。它可以是救死扶伤的崇高之地,也可以是肃杀腌臢的灰色地带,且随着近年来医患矛盾常被诉诸报端,医院更是被妖魔化为大众文化中的异质空间。在福柯构建的经典空间理论中,医院和学校、监狱一起被定义为典型的全景敞视式建筑空间。在这样的经典空间理论关照下,医院在中外文学作品中都被蒙上一层扑朔迷离的外衣。在《张医生和王医生》中,作者聚焦诊室这个医患交互最为密集和频繁的医院场域,力图勾勒出真实的医患沟通图景,以实现“祛魅”。

福柯最早将话语和权力机制引入空间概念。他提出主体对空间的控制主要是对话语权的控制,知识是话语的外在表征形式之一,他更是直言“话语即权力”^[6]。权力进入到空间领域并将其转为特定的话语场,形成特有的、规训的话语体系。医院则是这一话语——权力空间——的典型代表。医生是拥有专业知识的绝对权威,是诊室这一空间的权力掌握者,因此他们和患者间的对话必然呈现出一定的中心化、单向度的特征,而患者则会不自觉地遵循这一规训空间中的话语秩序。因此,张晓刚医生提到,“有的患者总是胆怯,又担心漏掉重要信息,所以控制不住总要说个没完”^{[3]90},且处在权力他端的患者在和他的交流中总是夹杂着“恭维的话”。讽刺的是,这些由虚假话语累积成的诊室空间却是张医生构建自我身份的主要阵地,日久经年,他必将无法获取真正的职业认同抑或说社会身份认同,也必将导致其自身摆脱波希米亚式知识分子角色的努力付之东流。“融入社会”是困扰张医生近40年的文化迷思。社会是什么呢?按照齐美尔提出的社会空间论,社会是“各种人际交往的关系总和”^[7]。张医生虽每天接触形形色色的人,但大多是囿于医生和病人的关系,“即使不是医患,接触的另一方也只愿意把他们当作医生,于认识世界无补”^{[3]79},换言之,与融入社会无益。思及此,他摒弃了诊室空间掌控者的身份设定,“希望给患者留下一种踏实的感觉,有意引导气氛往‘放宽心’那个方向去,希望为患者做点额外的东西,比如省点钱——他几乎会问每一位患者从哪里来,判断一下对方的经济状况,然后给出解决方案”^{[3]97},这从张晓刚医生与病人的言语交流中可见一斑。

第十九号是昌图人,张医生有两种解决方案。

“你这个得做手术。”

“支架呗?”

“可以支架,可以剥脱。”

“剥脱是什么概念?”

“血管切开,然后给你缝上。剥脱都好几十年历史了。你多大年纪?”

“68岁,别的啥病没有。”

“支架费用高。但它创伤小。”

“哪个风险大?”

“都大。”

“我听大夫的,你是权威。到时候给我们做呗。”

“剥脱之后事少。剥脱就吃一种药,三十块钱吃一个月。支架复查比较费劲。”怕说得不

够形象,他又补一句,“剥脱超声后期维护成本低,跟车似的。”

“现在能住院不?”

“我得看看有没有床。”

“我们也想做手术了。”

“我们两个做得都很多。”

“我们信你。”^{[3]87}

家常式的对话改变了诊室空间中医者单向话语的建构路径,为这一纯粹的物理空间注入了人文关怀。张医生凭借自身悲天悯人的文化情怀和医者仁心的道德坚守慢慢填补着横亘在医患间的权力真空,故此,他收获了来自病患最真挚的言语表达:“我信不着他们,我信您。”^{[3]88}这不啻于对其专业知识和职业操守的最高褒奖。这些流淌着脉脉温情的新的空间场域,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张晓刚的权力中心地位,铸造了其身份的多元性,为他带来极高的自我认同感,因此在诊室的张医生“看起来很放松”,他“从工作中获得喜悦”并且“热爱自己的工作”^{[3]90}。

(二)“好大夫”医疗平台

如梅罗维茨所言,网络空间作为一种新型的空间形式,既是传统物理空间的补充,“也改变了人们的社会空间和场景感知”^[8]。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和数字媒体的盛行,网络医疗逐渐出现燎原之势,各大线上医疗平台不断涌现。王平医生顺势而为,自 2014 年开始在“好大夫”平台开始回答患者问题,他自诩可以“弯道超车,直接移动互联网”^{[3]73},借此将医疗空间从逼仄的医院延伸至无远弗届的互联网络。

相较于医院这个囿于物理边界的地方空间,线上医疗平台消除了医患间于时间、空间维度上的限制,使得医患的交互得以挣脱时间和地域上的桎梏。这种新兴的交互形式必然会生产出新的关系,编码新的空间逻辑,为破除医患之间旧的权力格局且赋予医者新的身份维度提供可能。不同于医院里传统的治病模式,为了获取患者更高的关注度,网络医疗平台邀请病人为医生的服务打分,这些数字则是日后医生能否被更多患者选择的关键依据。网络空间的崛起,加之消费主义的强势介入,诊室空间秩序被重新定位,医疗成为可以量化的商品,医者是服务的提供者,病人则变成了购买服务的消费者。在这种新的空间逻辑下,医生的医学专业知识成为新型场域架构下的背景板,医生完成精神慰藉者、服务提供者等多重身份转向则成了当务之急。当然,新的空间环境的出现也会导致生活在其中的个体对空间文化认同需求的骤增。王平医生为了获得“患者流量”,“给自己设了闹钟,早晨四五点起来抢答患者的问题,以此获得关注”^{[3]77},即使他一天在医院有十几台的手术,他还是尽量在吃饭前、等车时、手术换台的间歇里回答“好大夫”平台上的问题。经过不断努力,王平成功超越全国同一领域的其他医生,跻身网络医生好评榜的前列。在参加“好大夫”平台峰会并获奖时,他更是觉得这个奖“是对他最高的赞美”^{[3]82}。此外,王平医生网络口碑的发酵产生了滚雪球般的效果,并延续至物理空间,为其所在的医院成功累积了更多的资源。王医生在物理空间(医院)和网络空间(医疗平台)取得的双重成功,无疑会极大提升其集体归属感和社会认同感,而这恰恰是影响他身份认同的诸多因素中,最重要或者说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对王平而言,相对于物理空间,网络空间更多的是一种心理需要,甚至是一种精神属性,这进一步填补了他和所在社会空间的罅隙,强化了自身的社会属性,也是他摆脱波西米亚知识分子的文化身份的新尝试。

(三)朋友圈

著名社会学家卡斯特在《认同的力量》一书中指出:“网络社会的意义是围绕一种跨越时空而

自我维系的原始认同建立起来的。”^[9]自我身份认同和群体身份认同是实现文化定位的两种基本表征。在新媒体时代,这两种认同越来越多地通过社交媒体得以实现。朋友圈就是这其中的典型代表。书中张晓刚医生也“跟一般中年人没啥区别”^{[8]83},通过朋友圈转发“热帖,时下流行的段子,无他”,他以个体化的名义在公共空间展示自我的内心生活或者文化偏好来完成自身的真实呈现,虽然这在他定义自我的过程中不可或缺,但是他的朋友圈很大程度上还是隶属于私人领域,所拼凑出的个人形象是剥离社会身份属性后的模糊面孔,这于他获取社会认同并无裨益。故此,受到王平医生网络问诊的启发,自2017年以来,张晓刚开始在朋友圈发布和分享医学知识,“大脑CT造影图像、脑血管结构的三维建模开始占据他朋友圈的主流位置,偶尔还混进去一两篇转发文章,不是神经外科就是和医院有关”^{[8]83}。他开始有意识地通过网络空间来建立和拓宽自己的社交圈,塑造自己的专业形象,这是寻求自我认同的体现。同时,因其“朋友圈的浏览者大多也是同行”^{[8]84},张医生以医学知识为纽带,利用新的媒介渠道,形成某种意义上大范围的专业共同体,以期获取群体归属感,这种归属感是一种社会认同,或者说是一种集体的表征。当个体归属于特定的社会群体且获得认同也会赋予其某种情感和价值意义,这正是把单个的人聚集成具有向心力群体的黏合剂,可以帮助张晓刚实现“早日融入社会”这个萦绕半生的夙愿。

如鲍曼所言,“流动的时代和流动的生活给我们带来流动的恐惧”^[10]。瞬息万变的社会发展和不断变动的身份使得张、王两位医生对稳定的社会归属感充满了渴望,他们融入社会的坚持使得他们将地方空间延展到流动空间领域,这是属于个体身份的微观建构,也可扩展到沈阳甚至是整个东北地区所构成的宏观空间中。这些城市或者城市聚合体,同样由流动空间和地方空间共同构成,“流动空间通过互联网络把不同地方的行动与人群连接起来,地方空间则把地方范围内的经验与活动组织起来,城市同时被这两个互补又竞争的逻辑所架构”^[11],这既为沈阳的城市空间书写增添了新的维度,也给生活在其中的个体的身份认同提供了新机遇。

三、城市发展空间

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沈阳就被打上了重工业、计划经济、保守的、北方的等形形色色的标签。到了1990年代,经济重心的南移和市场经济的蓬勃发展,上海、深圳等大城市急速发展,一跃成为经济繁荣的特大型城市,它们共同组成了东北人眼中的“南方”。东北对南方的关注缘起何时呢?文中提到,《沈阳日报》最早关注到南方的崛起并刊发了文章《为什么沈阳小百货不受欢迎?》,记者细数沈阳经济不能以新取胜、不能薄利多销、不注重装潢等三宗罪,最终盖棺定论称其为“重工业城市的特征”,这导致了东北“对标南方从此开始”。后来《沈阳日报》又陆陆续续地发表了《酒香也怕巷子深》《沈阳货在外地受欢迎吗?》等文章,而在《我们究竟差在哪里?》一文中,传统媒体对沈阳处于衰败境地的不满情绪可谓达到顶点。随着沈阳在南北经济竞赛中领先地位的一去不返,加之传统媒体批评话语的推波助澜,富庶繁荣的南方逐渐变为沈阳人映照自身状态的镜子。而镜子这一意象在福柯构建的空间话语体系中,是典型的兼具乌托邦和异托邦特征的空间表征,南方成为虚拟和真实场域的重叠体,它的空间边界随着东北经济的衰退而不断延展,最终成为漂浮的、模糊的能指,因此书中提到的南方在沈阳人看来“有时候是深圳,有的时候是海南,闲下来的时候可能是他们迷之热爱的江南”^{[8]507}。

无论南方在空间层面上表征为某个小桥流水的南方城市还是笼统地称呼经济发达地区的空间群像,不可否认的是,南方在经济领域的一骑绝尘加快了其进入“陌生人社会”的进程。“陌生人社会”这一概念最早由齐美尔提出,它“以规则、契约、条例与法律为纽带”^[12],呈现出独立、自由、平等的社会形态。在追溯其起源的历史进程中不难发现,现代社会文明的发展和市场经济的促动是其形成和发展的最直接原因。用这一概念来关照本书中的南方最适宜不过。南方因其空

间距离遥远,且兼具现代化、工业化程度高的双重特点,呈现出开放、流动、包容性强的空间特征,与“陌生人社会”的概念不谋而合。而与之相对的则是“熟人社会”,这一概念最初由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一书中提及,通俗来说,“有人好办事”就是这一社会的典型话语。文中的沈阳地区因地理空间上的局限和经济上的不景气,被贴上了凝滞、封闭、保守等“熟人社会”的标签。王平医生曾言:“北京上海好,做什么事不用拼关系,省心,不像小地方,屁大点事都需要托人。”^{[3]515}他无疑将自身无法实现抱负、难以一展拳脚的困境归咎于沈阳地区错综复杂的人际网络。虽然从“熟人社会”升级为“陌生人社会”是社会经济文明进步的佐证,但细观之下不难发现,这个舶来的文化概念进入中国语境后无法与现代社会紧密啮合,因为南方物质空间概念始终无法遮蔽它兼具社会空间功能的事实,换言之,陌生人社会有过于理想化的倾向。王平医生在言语中将陌生人社会这一概念的内涵和外延都无限放大,对南方的描述抽空了其作为空间概念的社会属性,使其变为了流光溢彩但却空洞死寂的“容器”。

随着南方经济优势的不断扩大和东北群体对自身生存空间不满情绪的加剧,“南方终于成为了边疆神话”^[13],南方渐由空间概念变成经沈阳人加工的、虚拟的文化景观。一方面它囊括了东北人对完美世界和美好生活的想象。王平医生就直言:“南方有着更好的经济、更好的医疗设备,因此有着更好的专业条件,温和而有尊严的社会关系,友善的人际交往,对技术的尊重,金钱和财富的中心地位。”^{[3]400}他几乎每次谈话都要表达对南方的向往,“南方是对他的人生观的肯定”^{[3]400}。由此可见,南方拥有在经济水平、科学技术、人际交往等众多领域上的绝对优势几乎成了沈阳甚至是整个东北的文化无意识。另一方面,南方也扮演着文化他者的角色,在其观照下,沈阳乃至东北地区愈发相形见绌,这也导致东北人对南方态度的悄然转变。初始时,东北对南方的艳羡只是无可奈何花落去般自我嗟叹的另类表达,而南北差距的日益扩大使其坠入难望其项背的绝望情绪中,最终转向幽怨。因此在沈阳的民间话语中,“当令人不解的事情发生时,当社会发生变化时,那一定是因为南方人”^{[3]399}。故此,沈阳在对南方的“爱和有时候的看不上和大多数时候的自愧不如”的态度中“周而复始地纠缠”^{[3]396}。

从本质上说,社会是人的社会,是一切空间活动的集合体。随着张晓刚和王平两位医生与沈阳社会空间的深度互联,他们也逐渐洞悉无论南北都是社会空间和物质空间的叠合体,无论身在何方,人都是这个巨大互联空间场域中的一个节点。故此,王医生虽时常借南方社会来抒发自己的不得志,但是他从未对去南方“付出过任何努力”^{[3]516},而张医生在女儿选择去无锡这个典型的南方城市读书时,他提出“还是家门口好”^{[3]516},在小说结尾处更是明确表示,“如果自己回到30岁,也是坚决不会去南方”^{[3]516}。这当中固然有故土难离的乡土情结,但更多的是两位医生对沈阳城市空间的和解以及对自我认知更为清晰和成熟的反应。

四、结语

故事记述了张医生和王医生在沈阳几十年的人生沉浮,他们的成长经历和沈阳的城市变迁有着同构性和历时性。如同无数根植于这座城市的人一样,他们被晕染上浓厚的沈阳色彩,在持续半生的社会化过程中被这座城市持续塑造,而他们的身份建构过程也是“沈阳性”精神特质的曲折表达。从曾经的工业重镇到后工业时代的迁移,从引以为傲的工人阶级到适应城市转型的普通大众,从老建筑的移除到新地标的矗立,千千万万的沈阳人正和这座城市一起经历一场文化和空间的双重转向。沈阳不是文学作品或是影视作品中充斥着浓烈乡土气息的草根聚集地,它是中国众多的经历漫长城市化地域中的一员。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和网络时代的到来,沈阳的城市空间也必然呈现出新的时代特征,而新的空间景观和空间表征对生活在其间的沈阳人来说,也是一次身份和文化认同的新挑战。

参考文献

- [1] 霍尔.文化身份认同的问题[M].庞璃,译.郑州:河南大学出版社,2010:275-276.
- [2] 傅瑶.沈阳作家群与沈阳城市文化身份建构:以双雪涛、班宇和郑执创作为例[J].渤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2):76-79.
- [3] 伊险峰,杨樱.张医生和王医生[M].上海:文汇出版社,2021.
- [4] 康奈尔.男性气质[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78.
- [5] 霍加特.识字的用途[M].李冠杰,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34.
- [6] 许宝强,袁伟.语言与翻译的政治[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13.
- [7] 齐美尔.桥与门:齐美尔随笔集[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1:2.
- [8] 梅罗维茨.消失的地域[M].肖志军,译.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47.
- [9] 卡斯特.认同的力量[M].曹荣湘,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77.
- [10] 赵静蓉.文化记忆于身份认同[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193.
- [11] 卡斯特.21世纪的都市社会学[J].刘益诚,译.夏铸九,校译.国外城市规划,2006(5):93-100.
- [12] 齐美尔.社会学:关于社会化形式的研究[M].林荣远,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2:512.
- [13] 刘岩.《张医生与王医生》与跨域文化生产脉络中的“东北文艺复兴”话语[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21(5):122-141.

On the Cultural Writing of Urban Space and Identity in Northeast China: Taking *Doctor Zhang and Doctor Wang* as an Example

TANG Hong, LI Ke

(School of General Education, Bengbu Medical College, Bengbu, Anhui, 233000, China)

Abstract: The acceleration of urbanization has led to the transformation of Shenyang and other northeastern cities. Unlike the traditional narrative perspective that focuses on industrial workers to portray the northeast, *Doctor Zhang and Doctor Wang* takes a microscopic view of the ups and downs of lives of two doctors, seeking to paint a grand picture of the changing urban space and cultural landscape of Shenyang. Caught in the conflict of the old and new cultural contexts of Shenyang, the two doctors encounter identity difficulties, but at the same time struggle to find and construct a new cultural identity. The individuals embed space in their socialization, using it to distinguish themselves from others, in order to fulfill their own purpose, complete the transformation from social identity to psychological identity, and ultimately form a complete cultural identity based on the spatial context.

Key words: *Doctor Zhang and Doctor Wang*; northeast China; writing of urban space; intellectual; cultural identity

〔责任编辑:王建霞〕